

貨公司、娛樂場等地方羅列出來的同時，他的主題也在寓言的層面上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來，它們在「摩登」這個總的意象裏自由地、歡欣地敞開，這是它們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第一次得以如此隆重地集體亮相，如此光彩奪目地共同隱喻一個現代性的無窮疆域。

而在這裏，他也顯示出了和本雅明的不同。本雅明「在那個時代裏找不到甚麼他喜歡的事情」，而李歐

梵卻是由衷地喜歡這個時代裏的所有摩登產品。機械讓本雅明感到毫無防備的震驚，但李歐梵卻隨時準備擁抱各類都會的刺激。所以本雅明是「一個馬克思和一個現代詩人」；而李歐梵則只在現代詩人這點上和本雅明匯合。此外，他是一個小說家，一個遊手好閒者，一個偵探和一個批評家。而正是在此意義上，他的批評是一種非常摩登的批評，一種可以有很多讀法的批評。

建構中國市民社會

• 丁 為

作者理性地認識到僅僅強調政治權威的轉型無助於中國現代化兩難癥結的化解，最終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關鍵在於逐步確定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進而形成二者之間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



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單就全書結構形式而論，《國家與社會》毋寧說是作者關於中國市民社會系列研究的七篇論文的結集。前五篇論文依時序分別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創刊號及總第3、5、8和15期；後兩篇則是作者分別為其與美國社會學家亞歷山大教授共同主編的《國家與市民社會》和朱英教授所著《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兩書所寫的序文。然而，本書又並非一本單純的、主題集中的論文集，它更是內容充實、體系完整、分析透辟、論證充分而周全的一本實實在在的「書」。全書沿循「建構—解析—批判」的研究路徑展開，其內隱的邏輯結構不言而喻。

作者首先給出了中國市民社會

之概念，並界定了它在國家—社會二元結構中的活動場域。國家佔據了作為政治設置的制度空間，此外則由社會成員按照契約性規則在自願自治基礎上組織而成的市民社會佔據着自由進行經濟、社會活動的私域和議政參政活動的非官方公域。由於中國是一個現代化的遲—外發型國家，它需要改造傳統的政治結構和權威形態，進而「在新的基礎上重新獲致合法性和社會支持力量，並轉換成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治核心」。那麼，究竟如何整合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市民社會，才能保證既避免政府的威信與權威合法性資源在社會變革中的過度流失，又能防止其因缺乏外部社會制約或因社會失序而出現「回歸」傳統之趨向呢？作者檢討了新權威主義與民主先導論在改革中國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過程中的言論主張，理性地認識到僅僅強調政治權威的轉型無助於中國現代化兩難癥結的化解，最終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必須營建一個健康的市民社會，並逐步確定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進而形成二者之間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這表現為：國家為市民社會提供制度性法律保障，並通過抽象立法行為與具體的執法、司法行為，對市民社會進行必要的干預和調節。市民社會則作為制衡國家的力量，培育和發展多元利益集團，為民主政治的實現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通過對形成中國市民社會的由上而下的國家因素、由下而上的社會因素以及由外而內的外部因素的回顧總結，作者提出了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兩個階段論」：一

曰形成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結構階段；二曰市民社會積極參與國家決策階段。冷靜的分析與理性的思考，使作者深諳中國市民社會建構的長期性與艱巨性，並在此一問題上始終保持着足夠的自覺與高度警省。

完成建構中國市民社會這一艱巨的目標性任務後，為了不致於因切斷歷史、盲目照搬西方市民社會理論而產生「形式主義的謬誤」，作者考鏡源流，開始了解析西方市民社會與國家在學理上的分野及兩種學理架構的努力。批判政治專制、力倡個人自由的近代政治自由主義思想與反對國家干預、弘揚市場經濟的近代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對西方市民社會與國家在學理上的分野產生了極大影響。近代政治自由主義立基於社會先於或外於國家而在的觀念，在霍布斯 (Thomas Hobbes)、洛克 (John Locke) 和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等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那裏得到了強化，它關注如何使國家權力受到限制以保障個人的天賦權利。以重農學派和古典經濟學家為代表，近代經濟自由主義認定，「自由放任」原則與「看不見的手」的規律性力量使社會擁有自身的內在動力和不受外界影響的規律，從而使社會獨立於政治或國家。上述觀念從結構和內容兩個方面為十九世紀初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理論分野構設了明確的思想框架。作為市場經濟的產物，市民社會與國家在資本主義時代完成了現實中的分離；而其學理上的分野則基於它們各自具有的內在規定性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同的終極目標，只是在

通過對形成中國市民社會的由上而下的國家因素、由下而上的社會因素以及由外而內的外部因素的回顧總結，作者提出了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兩個階段論」：一曰形成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結構階段；二曰市民社會積極參與國家決策階段。

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的政治理論中才首先得以完成。作者區分了黑格爾「國家高於市民社會」與洛克式「市民社會先於或外於國家」兩種架構，指出黑格爾將國家神聖化不僅否定了市民社會之於國家建構的正面意義並因此構成了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一種歷史反動，而且還隱含着國家權力可以無所不及和社會可以被政治化的邏輯，從而極易被誤導為極權或集權的政治獨裁主義。洛克式「市民社會先於或外於國家」的非政治化路向則往往趨於對無政府狀態的誤導，尤其令人憂慮的是，它認定市民社會具有自決於國家之外的天然權利，這種權利禁絕任何侵犯，而這極易走向假「人民主權」之路的極端。通過對西方市民社會與國家在學理上的分野以及其間發展形成的兩種市民與國家關係的學理架構的仔細清理與分析，作者就此結論：中國市民社會與國家二元架構間應呈現出一種良性的結構性互動關係。

建構與解析中國市民社會無疑是一項艱巨複雜的理論工程，它要求我們分析、總結構成中國轉型過程之基礎的三種知識系統——以中國差等結構為依歸的文化傳統、以全權國家為核心的新傳統和百年來因變革而傳入的西方文化傳統——以及它們賴以為基的結構性基礎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緊張、衝突和融合。由於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和現代化理論緊緊地交織在一起，因此「透過謹慎的知識學分析和中性的方法論研究」，作者對支配中國論者尋求西方經驗和理論支援，以及被中國接受為經驗和知識

層面當然示範的「現代化框架」，進行了深刻的檢視與嚴肅的批判。「現代化框架」將世界各國作傳統與現代的簡單兩分處理，以邏輯合理性代替歷史的真實性；它在設定傳統是整體且同質的基礎上，視傳統為整體的落後，從而忽視了傳統中隱含的向現代轉型的深厚的正面性資源；尤其是它預設的那種一成不變的單線性歷史進化圖式將西方發展經驗的偶然轉換成一種普世的歷史必然，從而否定了那些條件不同、文化相異的國家發展出具有特殊品格的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在「現代化框架」的支配與西方市民社會理論及實踐經驗示範下的中國市民社會的實體建構，同時也意味着一種研究範式或解釋模式的主張。然而，這種主張並未「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間的真实互動關係進行範例性的解釋和分析」，它依既定的理論模式在中國的歷史和現狀中尋覓與之吻合的事實依據，由此不當地切割了中國多元且多重性的歷史現象，並且否定了以差等結構為依歸的中國文化傳統之於整合中國市民社會的正面意義，也否定了中國自身發展經驗對於形成中國市民社會特殊品格的可能性及重要性。因此，本着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反思或批判精神，作者認為我們在向西方尋求經驗支援與知識資源的取向上，應時刻保有對支配這種取向的「現代化框架」的批判，並釐清國家與社會整體性分析框架的限度。唯其如此，我們才可能在解析中國現代化所遭遇的諸問題的過程中逐漸建構起符合中國歷史及現狀之真實性狀的市民社會理論。

被中國接受為經驗和知識層面當然示範的「現代化框架」，不當地切割了中國多元且多重性的歷史現象，並且否定了中國自身發展經驗對於形成中國市民社會特殊品格的可能性及重要性。因此，我們在向西方尋求經驗支援與知識資源的取向上，應時刻保有批判的態度。